

湖北省图书馆馆藏孤本《灵泉志》 之编纂历程与史料价值

涂明星

提 要:灵泉山(今武汉市龙泉山风景区)是典型的“风水宝地”。自汉代至明初,相继云集了一批豪门士绅,他们的文集、笔记、书信、谱牒、楹联等文献被辑录成“灵泉古志”,经多人批注,传抄甚广。在明代中期遭遇朱明楚藩强占后,流落民间,几乎散佚。直到清代中期,江夏县秀才汤铭新、汤盘兄弟寻得两部濒于佚失的“灵泉古志”残本,编纂成为《灵泉志》。《灵泉志》属清抄孤本,原件藏于湖北省图书馆,列为特藏。该志以不同形式记录了封建士人阶层的生态环境、生活状态及其价值取向,揭示了龙泉山两度沦为废墟的真相。

关键词:《灵泉志》 乡邦文献 研究价值

武汉市龙泉山自汉代起称江夏山,俗称夹山、峡山,唐天宝中改为灵泉山。朱明楚藩强占后,将其毁为废墟,改为今名。龙泉山系拥有地理奇观,两列峰丛自西向东并行,形成“二龙戏珠”之势、“五龙奉圣”之相,历来奉为“福地仙壤”“风水宝地”。大批士绅在此聚集,创造了龙泉山历史文化的辉煌。然而,龙泉山成也风水,毁也风水。风水决定了龙泉山历史文化多舛的命运。

一 汤铭新其人其事

汤铭新,汤氏宗谱名之璋,字聘夫,号半品,后自号长岭山麓老人。清乾隆二十三年(1758)出生于湖北武昌府江夏县西径里长岭山,卒于道光五年(1825)。平生酷爱读书,专注于家族文献和地方史志的编纂整理,以教书为业。汤铭新出身书香门第。祖父汤上载(1687-1765),“号长岭,忠厚孝友,慈爱朴诚。雍正乙卯、乾隆庚午前后,两值岁侵,共捐钱四百串,谷六百石,以赈贫苦……子文光、龙光,太学生”^①。父亲汤龙光(1732-1807),谱名乐天,字宏元,号普庵,乾隆三十四年(1769),作为贡生入选清代最高学府国子监。汤铭新作为长子,父亲见他赋质纯敏,很是器重。于是建塾教读,延请名师,督率严格。他本人也不负父望,“励志芸窗,无寒暑间”^②,嘉庆十三年(1808)考中秀才。观其职业生涯,做了四件大事:第一是教书授业,是他的职业,也是他的本职工作。受聘于同里傅氏定邦学馆充任塾师,“为人和厚坦直,与人交不涉城府,性耿介,丝毫不妄取,授徒课子,外事不干己者,概谢之”^③。第二是建祠修谱。承接祖上遗愿,致力于宗族事务,营建祖祠、纂修家谱“以敦本睦族为己任,念谱牒之失修”^④。业余时间,积极整理宗谱资料,梳理世次属续,撰写先祖传记,策划营建祖祠。第三是放贷筹资。为了筹集更多资金,拿出自家资财冒险放债,历近20年,本息累至“千余金”^⑤。放贷积息并非谋求个人利益,而是期求早日完成建祠、修谱的夙愿,因而在宗亲中口碑极高。第四是著书立说。虽然年过花甲,仍不遗余力,“遍加丹黄所著《饮冬文稿》

① [清]陈元京、范述之:《江夏县志》卷八义士条,乾隆五十九年(1794)刻本。

②③④⑤ 《汤氏宗谱(日新堂)·半品公墓志铭》。

(即《灵泉志》)及诸杂录”^①,抄录、校勘、注解、评释,累累盈尺,乐不思蜀。正当祖祠即将开工奠基、家谱未及授梓之时,终因积劳成疾,病入膏肓。即使在移床易簀之日,晚上还手不释卷,还不时把儿孙叫到身边跟他们讲解《尚书》。其临终遗言是:“我半生疲役,惟祠谱两事未就,无以告我祖父于九泉也。”^②虽然对于家族祠谱两事怀有无限遗憾,但完成了《灵泉志》的编纂、评释工作。也许他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《灵泉志》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,事实表明,该志成为研究龙泉山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地方文献。因为这部未能付梓的抄本,到目前为止仍属孤本。汤铭新当属武汉地方志事业的重大贡献者。

二 编纂《灵泉志》的艰难历程

汤铭新曾经与姑舅老表刘桂翼(乾隆五十一年,即1786年丙午科举人,字芳秋)等人乘船渡过三汊港(今龙泉与豹澥之间的梁子后湖三汊港),游览龙泉山,对龙泉山水、风物文化,以及朱明楚藩王寝废墟有深刻印象,并产生极大兴趣。他得知“《灵泉古志》所以存人物之盛、宅第之美”,却“遍索未得”^③;倍感惋惜的同时,也萌生了书写这块神奇地域曾经辉煌的念头。嘉庆八年(1803),汤铭新仲弟汤盘寻得一部《灵泉古志》,但残缺不全,再次激发他的好奇心。到道光二年(1822),汤铭新在他任教的定邦学馆,得到东家抄藏的《灵泉古志》一部,欣喜万分,如获至宝。方知该书“自汉唐而宋、而元、而明,凡湖山景色、人物仪容,与夫风俗教化之美、诗词歌赋之学、往来赠答之章,无不备载”^④。从此,以他为主,汤盘协助,开始了艰难的编纂、抄录历程。(1)校勘与订正。《灵泉古志》为手抄地方文献,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辑录,且经过多人抄录、批注,难免有错讹之处,汤氏兄弟在编纂中予以校正。(2)注解与评释。对主要的历史人物事件作注690余处,点评10余处,自撰文稿4篇。遇到有疑义莫解的情形,则参阅《明史》《明纪》、省志、县志以及相关家族宗谱等文献,费尽周折,求得确解。(3)实地考察。考察士绅宅地、祠堂、亭台楼阁,以及寺观等文物景观的具体方位,加以注解,摹绘示意图,增强立体空间感。(4)编辑分卷。该志共三卷,无目录但有分卷章节。“首卷 纪序记传案稿赞文”为第一卷,收录描绘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文稿、先贤赞文共103篇;“中卷 记序论疏文”为第二卷,收录名门家族宗谱、书信、士绅文稿共96篇;“下卷 形势诗章匾对”为第三卷,收录以本土士绅为主体的诗词歌赋、匾额对联,描绘楼堂宅院等建筑景观及名人墓葬的图片,共479篇,其中熊廷弼《灵泉诗叙》1篇,诗词歌赋379首,匾额25幅,对联51副,图片23幅。该书蝴蝶线装,无版框,无版心,无书口,未编排页码,每页满页8行,满行20字,有断句标注。右起直行,起行为标题,上空2格,著录者姓名和文中注解,以小一倍字号书写。著录者身份信息视内容多少而定布局。全书以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而成,版面清丽,笔法工整,古意浓郁。

三 《灵泉志》揭示龙泉山两度成为废墟的秘密

(一)渐入繁盛的文化景象。龙泉山作为湖广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文化村落,仅约8平方公里的山间谷地,豪族集聚,士绅蔚起,官宦林立,文学丰盛,亭台楼阁鳞次栉比,科举盛况空前绝后。江夏灵泉山,堪称湖广“乌衣巷”。从汉朝到明代,相继聚集了当时具有社会身份或地位的56个家族,其中以张、沈、李、杜、董、樊、曾、邹八大姓(通称“灵泉八达”)最为

①② 《汤氏宗谱(日新堂)·半公墓志铭》。

③④ 《灵泉古志·灵泉志叙》。

著名。自汉至明,官宦士绅建造的人文景观达90多个,从唐到明见于经传取得功名并在朝廷、地方为官者多达60人。其中宰相级人物有4人,三省六部官员近10人,尤其在明初,相继有40人取得功名,并授任官衔。张家叔侄连连上榜,李家兄弟三人同榜,一时传为佳话。

(二) 龙泉山一度沦为废墟。朱明楚藩强占地方缙绅世代居住的“风水宝地”,强行驱赶“灵泉八达”等56个家族,封山造墓,驱逐士绅,摧毁文物。龙泉山历史文化遭遇灭顶之灾。朱桢(1364-1424)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六子。洪武三年(1370),年仅7岁被册封为楚王,洪武十四年(1381)在武昌就藩,深得朱元璋器重。朱棣登基“削藩”后,朱桢又赢得了朝廷的信任,兼任皇室宗人府宗正。永乐二十二年(1424)薨于武昌,享国54年,朱棣赐谥“昭”。朱桢一直在寻求安葬山环水抱、坐北朝南、藏风聚气的“风水宝地”,最后相中龙泉山这块背山面水朝阳有缓坡,且有“二龙戏珠之势”的狭长谷地,决意将此辟为“寝山”。然而这块宝地先后聚集了一批既有前辈荣勋,又有自身功名的士绅群体。他们世代居住此地,并且也认为因“风水”得以享受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,家族才得以兴旺发达,尤其是张、沈、李、杜、董、樊、曾、邹八大家族,才俊辈出,世代为官,充盈朝野,而且在地方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而与明朝宗藩注定有一场土地争夺战,他们未曾料及。

朱明楚藩采取三步走:一是提出以一换三的条件换地。“(武昌)忠孝门外离城60里,有灵泉屯,四面皆山,乃虎踞龙盘之地,所居者俱是官宦之家——自唐宋以来,乃八达之大家。楚王请勘舆先生傅姓谋地,看中灵泉。欲山中修寝葬坟,将外地买三亩掉一亩换出。”^①二是一计不成,便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。“沈阁老(元末观文殿大学士沈如筠)不允,与楚王面圣。皇上劝语,沈阁老推让,赐沈姓朱。调出方城(昭王莹园城墙)一段。”^②三是对毫不退让的家族实施强行驱赶。以张李两姓为首的一批士绅不甘让地,频频上书告状。“曾、李、郑、杜、尹、樊、赵,有山有冢,皆不怕死。我不惜残躯,与藩面谕。头可断而宅不可换,骨可碎而冢不可迁。”^③一是宣示祖居来历,二是联合抗拒,三是频频告状。从正统十二年(1447)起,夺地之战开始。八大家族开始与楚藩打起了长达90年的土地官司。官司惊动英宗、代宗、宪宗、孝宗、武宗、世宗六朝皇帝,状本叠案如山。靖王朱均鉞还使用苦肉计,增加胜诉官司的砝码。“迨弘治二年己酉(1489),王竟亲临面换。张长空(张通)等先声抗论,声喧林谷。王怒,自击其首,血本上奏,诬为谋杀。众姓俱走。”^④打官司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,嘉靖十五年(1536),从湖广步入金銮殿的嘉靖皇帝定案偏向楚藩。楚愍王朱显榕更加有恃无恐,对士绅形成“斩草除根”之势,迫使他们紧急逃命。被驱赶的56个家族纷纷背井离乡,迁居他乡。带头告状的张李两姓骨干成员有的因追杀而逃亡,有的因此受到牵连冤死于任上,有的隐姓埋名流落他乡。楚藩毁掉了几乎所有的住宅、宗祠和亭台楼阁等人文建筑,还掘了八大家族几乎所有的祖坟。龙泉山谷地毁为废墟。“夫以汉唐千百年精灵之气所郁积而成者,忽倾败于楚愍一人之手。勿论山内外之忠臣、孝子、文人、学士、隐逸、节烈,凄然遽斩,无复继起。”^⑤

(三) 龙泉山再度沦为废墟。楚藩乘势夺得大片土地。“青山,樊西赛祖地;班鸠原,李都堂祖地;牛角洞至后山,沈阁老业;东山至梁子湖,张氏家祖业。以上湖塘田地草山为楚府所有

①② 《朱氏宗谱(宝善堂)》首卷,清同治三年(1864)首修,1993年重刊。

③ 《灵泉志·与张学悟书》。

④ 《灵泉志·拨换灵泉山事实》。

⑤ 《灵泉志·灵泉序》。

所占。”^①“(楚王)合计连占宦田三千五百石,追其印契入库,以作宗产。合计占民产四百亩,以作鹅鸭田。合计占梁湖草场数百段,以为草料税……追劈《灵泉古志》,不知何意。”^②楚藩夺地占山后,实行封山,设营兵左、中、右三所,开始建造王寝。“内山不许百姓行走,外山不许车马践踏。往来行人,远避数里。”^③甚至山外周边区域划为“王界”,龙泉有一地名“王界”沿用至今。到明朝末年,在山内环山地带先后建造了昭、庄、宪、康、靖、端、愍、恭、贺9个王寝及茔园。9座茔园占地面积在50~170亩之间,均为内外城垣二重城格局,并有茔垣、荷花池、享殿、石几筵和地宫等配套建筑。其中面积最大的是第一代楚王昭王茔园,占地170亩,建筑材料全部是明代官窑生产的澄泥大青砖、汉白玉大理石、上等木材,耗资白银30余万两。昭、庄、端3座茔园各有赑屃碑亭。此外,还有25座王妃墓。凡属茔地工卫人员的生活物质,均由新建的粮马房供应,从而形成“建起粮马房,修起半边街”^④的局势。其建造规模仅次于皇陵,而建筑材料及工艺堪与皇陵媲美。9座王寝茔园中,在明末均遭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不同程度的毁坏。其他8座王寝茔园毁坏殆尽,唯有昭王寝园中除东配殿、西配殿、稜恩殿、山房、客堂、茶堂等建筑被毁外,其他保存至今,基本完好。昭王茔园的配套建筑设施也堪称富丽堂皇:“庙基盘白石晶莹若玉,四隅龙首翹然,涓滴檐水,皆自上石巃……庙左平达,山房、客堂、茶堂,无不洁净精微,壁间嵌有诸游览名诗,明末兵燹无存。有碑亭三,碑广数尺,长数丈;负以赑屃,广丈余,长数丈,崇如之,俨一石天成,蠕蠕欲活……游览之奇,钟毓之盛,盖于邑称巨观焉。”^⑤

楚藩以为凭借“风水宝地”能够永享太平盛世,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。然而到明朝后期宦官专擅朝政,政治更加黑暗,皇室、贵族、宦官、大官僚地主大量侵占民田,50多个藩王庄田达到5000万亩。机构臃肿,财政匮乏,不断加派田赋,导致官逼民反,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在陕西揭竿而起。崇祯十六年(1643)五月,“张献忠掠湖广,华奎募卒自卫,以张其在为帅。献忠兵至武昌,其在为内应,执华奎沉之江,诸宗无得免者。”^⑥农民起义军“令楚宗亲俱灭,投诸江者六千余人,自溺者一千四百余人,并灵泉各寝盗发,其衣棺遗骸皆化为乌有”^⑦。又“焚其庙宇,屯兵掘其寝室,而残碑断碣、碎尾颓垣出没于丰林茂草间,则向之所谓九寝者,亦荡然无余矣”^⑧。龙泉山再度沦为废墟。

《灵泉志》以龙泉山封建村落文化兴衰历程为主线,凸现了江夏土著文化及当地封建家族文化发展的特色,集中展现了封建士绅代表性人物的生活状态,并披露了明朝特定的历史节点地域社会矛盾,揭示了江夏龙泉山两度沦为废墟的秘密,为发掘龙泉山历史文化资源,进一步研究明代基层社会,特别是朱明楚藩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,是不可替代的乡邦文献。倘若没有《灵泉志》,后人难以知晓龙泉山历史文化曾经的辉煌。

(联系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务处 邮编:430205)

本文责编:杨海峰

① 《灵泉志·计开楚府所占》。

②③ 《灵泉志·杨慎、邹守益上言复勘楚藩奏疏稿》。

④ 武昌县志编委会编:《武昌县志》,第682页,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。

⑤ [清]陈元京、范述之:《江夏县志》卷一《山川》,乾隆五十九年(1794)刻本。

⑥ [清]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一百一十六《列传第四·诸王一》,第3573页,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
⑦ 《灵泉志·报复说》。

⑧ 《灵泉志·灵泉序》。